

漳州市 对外经济贸易志

主 编：承光大

副主编：陈景涛



海风出版社

主 编：承光大
副主编：陈景涛

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海风出版社

(闽)新登字011号

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主 编:承光大

副主编:陈景涛

出版:海风出版社

(中国福州鼓东路187号)

发行:海风出版社

印刷:闽南日报印刷厂

开本:889×1194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96千字

版次:1995年6月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7-80597-083-1/K·4

定价:(平)9.80元

(精)12.80元

序

黄仲渊

美丽富饶的漳州，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东南沿海较早开放的城市之一。位处厦门、汕头经济特区之间，与台湾隔海相望，区域优势十分突出。地属南亚热带气候，山、海平原俱全，孕育万千物产，是闻名海内外的水仙花故乡，四季百花争艳，终年佳果飘香。这里水陆交通方便，鹰厦铁路穿境而过，国道 324、319 线横贯南北；在 680 公里的海岸线上建有 51 座码头，其中有 8 个对外口岸，已开辟菲律宾、新加坡、香港、澳门航线，建立了外运船队。特别是我国“第二座蛇口”——招商局中银漳州经济开发区的崛起，打通了九龙江南岸出海口；国家一类口岸东山港对外正式开放，为漳州对外经济贸易创造了优越条件。

自古以来，漳州人民重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1300 多年前的唐嗣圣年间（公元 684 年左右），即有“胡商康浚遮”到漳浦来；南唐保大（943—957）中，有三佛齐镇国李将军到漳州来贩卖香货，建普贤院；明隆庆元年（1576 年）开放月港，对东西洋各国贸易，特别是与菲律宾的吕宋港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连成一条“太平洋丝绸之路”，月港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大的世界贸易港口，熙熙水国，万商云集，对外贸易盛极一时，出现了家殷户足，甲第连云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富民强，海运畅通，国民经济蒸蒸日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我市致力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绩，展现广阔的发展前景。

漳州对外经济贸易,历来的地方史志未能详加记述,这是地方史志的一个缺陷。《漳州对外经济贸易志》编写组的同志,根据地方志编委会统一要求的精神,上自漳州建州以来,下至 1990 年档案为限,广泛涉猎,搜集资料,认真考订,去芜存菁,分门别类,详加论次,集腋成裘,汇成大编,填补了地方史志的空白。让有关史志研究者和外商投资者、开发者、贸易者的借鉴,或有所启示。

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志

目 录

序	黄仲渊
第一篇 概述	(1)
第一章 唐宋元的漳州经济与外贸	(1)
第二章 明朝的海禁与开放月港	(8)
第三章 清朝的外贸政策	(18)
第四章 五口通商后的漳州经济	(22)
第五章 新中国漳州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28)
第二篇 管理体制	(32)
第一章 明朝漳州督饷馆	(32)
第二章 清朝前期	(35)
第三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8)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	(42)
第一节 机构沿革	(42)
第二节 商检与海关	(56)
第三篇 对外贸易	(58)
第一章 口岸	(58)
第一节 月港的兴衰	(58)
第二节 港口的开辟	(60)
第二章 工业产品出口货源	(66)
第一节 专厂、专车间	(66)
第二节 生产扶持	(77)

第三章 农副产品出口货源	(81)
第一节 生产基地	(81)
第二节 生产扶持	(93)
第三节 收购奖售	(112)
第四章 出口商品	(122)
第一节 概况	(122)
第二节 粮油食品类	(150)
第三节 土产畜产类	(168)
第四节 医药保健类	(187)
第五节 轻工业品类	(189)
第六节 工艺品类	(194)
第七节 五金机电及矿产类	(196)
第五章 进口商品	(199)
第四篇 对外经济往来	(203)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华侨投资	(203)
第二章 补偿贸易	(207)
第三章 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213)
第四章 “三资”企业	(234)
第五章 利用外国政府贷款	(244)
第六章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劳务输出	(247)
第一节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247)
第二节 劳务输出	(248)
第七章 社会团体	(251)

第一篇 概述

第一章 唐宋元的漳州经济与外贸

自周朝“七闽”内附，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的中原文化便逐渐影响及于处在新石器时代的闽族社会。漳州当时属于七闽（七个闽族部落）的一部份。春秋战国以后，闽族同化于越族，汉朝以后，越族又部份同化于汉族。自晋朝“永嘉之乱”以后，汉族大量南下，同时南下的还有瑶族（南宋始有“畚民”之称）等民族，漳州一带曾是民族繁杂的地方，但汉族已是主要的。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设立绥安县，领有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一带地方，属于从南海郡分设的义安郡（潮州）。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析南安郡地设立龙溪县，辖今芗城区、龙海市、华安县一带。并有兰水县之设，辖今南靖一带。龙溪、兰水二县属于江南道的建安郡。至隋朝，兰水、绥安二县并入龙溪县，辖区大体上相当于今漳州市（除长泰县以外）的八县一区。唐初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归德将军陈政来镇龙溪，结束六朝以来“插柳为营，阻江为界”的局面，结伐连渡，征服割据九龙江以西的少数民族，辟为“唐化里”；陈政之子陈元光继之平定“绥安之乱”，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奏准设立漳州及漳浦县于云霄漳江之北梁山南麓。开元四年（公元716年）迁设州、县治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划原属于汀州的龙岩县（包括漳平、宁洋）来属漳州。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迁州治于龙溪（今芗城区）。

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里说，漳州负山面海，“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在当时是一个边荒地区。在鼓励垦荒发展农业，“通商惠工”，“兴贩、陶、冶”政策之下，经过军民合

力开拓,农业、手工业开始发展。从归休于江东白石村(在今角美镇)的当时漳州录事丁儒的诗《归闲二十韵》可以知道,漳州一带已经种植双季稻,种甘蔗酿酒,植木棉为保温材料,主要水果有荔枝、龙眼、枇杷、芭蕉。从陈元光《落成会咏》的“海舶近通盐”之句可以知道,已经有船舶航行海上。

当时陆路交通不便,内河航运是物资交流的动脉。尤其漳州的第一大河九龙江,上游的龙岩县(包括后来分设的宁洋县、漳平县)土产顺流运销于中、下游,转输各地,这便是龙岩县划属漳州管辖的原因。凡有舟楫之利的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快,尤其漳州平原河流纵横,很快便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朝已改变汉朝的内陆对外贸易而以海上贸易为重点。《唐会要·少府监》载:“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委当道长史收市所需货物,……市了,任百姓交易。”可知道,当时南方沿海口岸不设互市监,对舶来品实行宽容政策,在朝廷委派当地官员收购所需物品后,允许外商与民间做买卖。唐朝外贸口岸主要有两处,一为“交广”,交州在今广西梧州一带,包括越南的一部份,直至广州一带沿海港口,主要与南洋和印度洋国家贸易;一为“楚扬”,楚州在今安徽淮河以南,至扬州一带,包括江苏,主要对朝鲜和日本贸易。唐朝的漳州,有时属于福建,有时属于广州,由于航海的发展,已经有了通过广州和扬州的对外贸易,开始有舶来品转输到漳州。现在叫做“百货”的,漳州从前称为“苏广杂货”,称百货商店为“苏广店”,是有历史渊源的。据《八闽通志》、《漳州府志》引据宋朝《漳州图经》记载:嗣圣年间(一些不承认武则天政权的史家,将武则天当权时的垂拱等年号一概抹煞,仍称嗣圣),有胡商康没遮经过漳浦温源溪(地处闽粤交通要道上的盘陀汤坑),投钱洗浴。从这记载可以知道,在漳州建州前后,已经有外国商人到来,来干什么虽无明确记载,但当不会是来旅游。明朝周起元在《东西洋考》序言里说:“自高骈凿南海之石,而夷人来市于粤,自王审知招航海之商,而闽人泛粤以转市于夷。”高骈于唐末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4年)任安南都护,那时广东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在经济上、政治上与广东关系密切的漳州,通过广东的对外贸易也就有所发展。到了五代十国

时期，漳州属于王审知为王的闽国。王审知与浙江的吴越王钱缪及广东的刘龙都致力于招徕外商，发展对外贸易，漳州在这种比较开明的政策影响下，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王审知实行“招航海之商”的外贸政策，漳州也就把一些物产“泛粤以转市于夷”（航运到广东与外国人交易）。及至闽国为南唐所征服，漳泉二州仍在陈洪进割据下，他以闽南一隅之地，人丁有限，而能维持一支万余人的庞大军队，直至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他还能与吴越王钱俶一样，将割据一隅的政权维持下来，至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年）才上表“纳土”（交出地盘），主要靠外贸维持军费。旧地方志不注重经贸方面的记载，五代时代漳州外贸情况不详，但可以从其他记载以见一斑。如《龙溪县志·古迹》记载：南唐保大十六年（公元 958 年）有“南蕃”三佛齐（今印尼巨港）镇国李将军来漳州贩卖香料，赚钱建了一座普贤院，这可证明五代时期漳州与海外的通商和经济往来。

宋朝在北方民族的压力下，人口南移，经济重心南移。漳州人口自宋初至元丰初年（960~1085 年）的一百多年里，由 2.4 万多人增加到 10 万多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自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 年）原属泉州的长泰县划属漳州管辖、漳州共辖：龙溪县，有六乡三镇；漳浦县，有三乡一镇。龙岩县，有二乡；长泰县，有二乡。值得一提的是，开始有“镇”的设置。漳州的镇都设在港口，其中龙溪县的海口镇即今海沧镇（已划属厦门），这可从《龙溪县志》得知；漳浦县的敦照镇即今旧镇，可从清《一统志》推知，臧励和《地名大辞典》所说已成定论；龙溪县还有清远、峡口二镇，还找不到充份资料证实现在作何地名，但可以从当时地名推论，“峡口”不外江流之峡口，当在九龙江中游交通要冲，“清远”亦在水运利便之处。这说明当时漳州的航运已相当发达，所以主要的货物集散地都在港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所有镇与州、县所在地都设“务”，是收商税的机构。漳州各地共设十个“务”，分别在：在城（漳州城）、漳浦、长泰、龙岩、清远镇、峡里（峡口镇）、海口镇（今海沧）、敦照镇（今旧镇）。商税分“过税”（行商税），值百抽二；“住税”（住商税），值百抽三。细物交易如自产生药、纺织品免税。税务所的设置，说明当地为商品集散的集镇。

农工商各业都是互相促进的,当时漳州农业也大有发展。《龙溪县志》记载: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龙溪县八、九都(今龙海市海澄镇)人谢伯宜秩满家居,疏通九十九坑水,筑海成田,从此,漳州沿海各地纷纷仿效。《宋史》记载,漳浦县(当时包括今之云霄、诏安、等县及龙海市的一部分)“硗确斥鹵之地,耕耨殆尽”,围海造田就成为大规模增加耕地的办法,从而出现许多以“埭”为地名的乡村。

漳州水果主要如荔枝、柑桔,宋朝已驰名远近。曾任漳州军事判官的蔡襄作《荔枝谱》,说“泉漳荔枝时亦知名”,并特别指出优良品种“何家红出漳州”。淳熙四年(1178年)韩彦直作《桔录》,说“柑别种有八,桔别种为十四,凡其类合二十有七,乳柑为第一,且极甘芳得名,又名漳柑,其种自漳浦来”。

我国古代主要以丝、麻、葛为衣料,棉是丝棉,所以从“系”写作“绵”,后来有了木棉,才出现“棉”字。木棉(不是有“英雄树”之称的攀枝花)属于海岛棉,木本,不同于从欧洲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草本陆地棉,而是从海岛传入闽粤。江浙一带在元朝才兴起植棉织布,而漳州在北宋已经兴盛,以至有因植棉特盛而得名的木棉村,宋朝漳州以庵设铺(驿路分站),木棉村边有木棉庵又称木棉铺,是南宋监押官郑虎臣诛杀被贬遣的奸相贾似道处。

漳州的蚕丝业在宋朝也很兴盛,明朝《八闽通志》有“漳古称善蚕之乡,岁五蚕,吴越(江浙)不能及”的记载。

在北宋,漳州纺织手工业已开始兴盛。当时人彭乘在《续墨客挥犀》一书中说:“闽岭以南土人竞植木棉,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或把棉纱染成五色,织成花布。”(吉贝是马来语 kapok 的音译写法,闽南话叫“胶簕”)。

同一时期,漳州的蔗糖已运销于江浙,据《本草图经》:“福建居民,研蔗汁煮糖,鬻诸吴越。糖有黑白二种,白糖有丙清,有洁白,炼之有糖霜,亦曰冰糖,有蜜皮,亦曰牛皮糖”。

漳州的盐,唐朝设立州县之初,适值自隋朝以来一百多年无征盐税期间,至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开征盐税,漳州属新开发地区,也设有按照朝廷法度加以管理收益。到末期,实行盐专卖配给,漳州开始设官

管理盐务。福建的“下四州”十个产盐县，漳州四县中占二县：龙溪、漳浦。龙溪县有吴惯、木槎、中栅三盐团，漳浦有黄墩一盐团。盐是国家一大财政收入，在漳州经济上占很大比重。

宋朝，瓷器为重要的外贸商品，漳州的瓷器分布于龙溪、漳浦、云霄、诏安、东山等地，多在水运利便地方，至今还有许多宋窑遗址，堆存和埋没很多宋瓷残件。漳浦至今还遗存“瓷灶”、“瓷窑”地名，东山也有“瓷窑村”和“瓷窑渡”，诏安县深桥乡“肥窑”村名是“瓷窑”的转音，龙海市郭坑镇附近的“扶摇”也是“瓷窑”的雅化（方言谐音）。龙溪县瓷产地是广阔的，今人考据，著名的“东溪窑”在今华安县境内，而清古籍《留吟斋话瓷》则说“东溪窑在石码”，当是石码附近（今龙海市步文镇）东溪村亦产瓷著名。现在又在海沧（原属龙溪后属海澄今属厦门郊区）发掘出大规模宋窑遗址。东溪窑起于宋而盛于明，以艺术品樽、瓶、佛像著名，其窑址当是不只一处。漳浦下寨港附近的“罗隐窑”宋瓷残件沿山麓遍布，鹿溪下游的南门坑窑宋瓷残件堆积二座山头，距佛昙港不远的南山宋瓷残件也堆积二座山头，石坑窑宋瓷残件堆积六座山头，赤土乡田仔乾宋瓷残件堆积八座山头，漳浦的宋瓷以碗盘为主。云霄漳江上游瓷窑所产则以小瓮“宋洞仔”为著名。东山南宋彩釉瓷碗、瓷盘残件遗留甚多，自明至今被利用剪贴为建筑物装饰图案。

上述种种丰富的物产促进了漳州与外地的贸易，航运随之发展，造船业开始兴起，《宋会要辑稿》载：“漳、福、泉、兴海滨之民自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

与外地贸易导致人口交流，与外国贸易导致外国人居留中国和中国人居留海外，尤其中国人侨居于东南亚一带为最多。据明初三次随同“三宝太监下西洋”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爪哇国”条记载：“爪哇国者，古名闷婆国也。其国有四处，先至一处名杜板，次至一处名新村。……杜板番名赌班，地名也。此处约千馀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聚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馀家”。又“旧港”条载：“国人多广东、漳泉人逃居此地者”。明初，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之杜板(Tuban)及苏门答腊之巨港(勃淋邦 Palembang)已经有很多漳州

人、泉州人与广东人，而且在杜板附近有一个漳州人与广东人合居的千餘户新村，可推断在宋朝漳州人和广东人已经去那里定居，因为没有百年以上不可能形成那样的新村。该书又载：中国历代铜钱在爪哇一带通行使用，可见中国与爪哇通商的影响。

元朝除至元三十一年至延祐元年（1294～1314年）一度取销市舶司，禁止民间对外贸易，改由政府专营以外，都沿袭宋朝的对外贸易制度，据《新元史》食货志之五《市舶课》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立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澈浦（在今浙江海盐县南）四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年）增设为泉州、广州、温州、庆元、杭州、上海、澈浦七市舶司。在一度停设之后，“延祐元年七月十九日钦奉圣旨：节该中书省奏，在前设立市舶，下番博易，非图利国，本以利民。比闻禁止以来，番货药物销用渐少，价值陡增，民用缺乏，乞开禁事，准奏。仰于广东、泉州、庆元复立市舶提举司。”

自宋以后，漳州的产品较大量地由广州或泉州转口输出，漳绒、漳纱、吉贝布（棉布）主销日本，铜铁器、锅主销渤泥（今婆罗洲的文莱）、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爪哇、天堂（阿拉伯），糖主销占城、三佛齐等地。输入物品主要是香料、药品。

但元朝有倭寇祸患，影响对外贸易的发展。因为自元世祖忽必烈派忻都、范文虎率十万海军远征日本，在五龙山遭暴风全军覆没，以后两国互相戒备，禁止交通，那些违禁继续通商的便成为海寇。漳州沿海一些地方在元朝已受倭寇蹂躏，由于自元朝至明初漳州无修地方志，府、县志缺载。但也并非全无资料。冯梦龙的“三言”往往有史实基础，《杨八老越国奇遇》说一则元朝的悲欢离合故事：陕西杨八老到闽南漳浦县采办由广州转口来的“番货”，遇倭寇登陆，他被掳去日本当奴隶，装束与真倭无异，数年后被迫随倭寇犯浙江，杨八老与一批倭寇一同被元朝官军俘获，那时，杨八老在原籍的儿子杨世德已经中进士任绍兴县丞，经过一番曲折，杨八老父子终于相认团圆。又：宋末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时，护国冲郡王赵若和逃到浦东的内阁侍郎黄材，传到他的孙子黄宽夫，十二岁时遇倭寇登陆，全家被杀，他（宽夫）被掳上贼船，出海后由于船超载，他被抛落海中，幸而抓到一块木板，漂流到大

担岛外,幸遇嵩屿人林世英从广东贩货回航,将他捞救,养到十六岁,以次女林二姐婚配,送回浦东。他找到出嫁于许家的姑母,帮他讨回被侵占的土地财产,重建家园于岭西,遂易“浦东”地名为“浦西”。他于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修族谱,将这惨痛经历写在族谱序言里,嘱咐后代分居地要以“西”字为地名。这“浦西”地名至清朝还沿用,现属龙海市港尾镇。

第二章 明朝的海禁与开放月港

倭寇祸患越来越惨烈。明太祖朱元璋在未称帝时的吴元年(1367年)已注意江浙一带的防倭军事。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专事海防建设。福、兴、漳、泉四府三丁抽一为沿海戍兵,共一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十六城。翌年又命将军汤和巡视闽粤,增城加兵。漳州沿海(南与广东相接,北至浯屿与永宁卫的中左所即厦门接哨),设镇海卫,洪武二十一年建卫城(在今龙海市港尾镇镇海村),辖前、后、左、右、中五千户所,有兵5307名。并置陆鳌(在今六鳌)、铜山(在今东山)、悬钟(在诏安)三守御千户所,都建城,各有兵一千多名。又设置井尾水寨,早在周德兴到福建经营海防时的洪武二十年便已临海筑石为寨,有兵一千多名,备战船、哨船、联系船46艘,四出巡逻(景泰年间移设水寨于铜山)。明朝前期漳州与全国各地一样,海域基本上是宁静的。那时,居于海防的考虑,与外国只有“朝贡”贸易,严禁沿海人民及守卫官兵私自与外国通商贸易,违禁的,视为“通番”,以海盜论处。所谓海防,主要即是防杜和严缉海上走私。

至明朝中期的宣德(1426~1435)以后,政治腐败,卫所松弛,军官以有功之将的后代世袭,不重操练,器械不整,船只破烂失修,巡逻不力,且逃亡严重,军官虚名冒饷,一方面屯田受侵占,军饷不能正常维持,士无斗志,以至卫所形同虚设。海上武装走私盛行,至嘉靖年间(1522~1565)达到高峰。当时人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四《福建事宜》说“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福鼎),各海有澳僻,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又《嘉靖实录》卷一八九载:“龙溪嵩屿等地,地险民犷,素以航海往来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当时漳州一带被诬称为海寇的海商之社会成份,他们大都是以土豪为主,纠合船主、水手、流氓、贫民结成的。海商武装集团的形成是

由于“强弱相凌，自相劫”，“因多结踪（踪，船队），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引据范表《玩鹿亭稿》卷五）。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大闹倭寇。按当时主持剿倭军事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奏疏中所说，“名虽倭夷，而沿海奸民实居其半。”（见《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六《胡太保奏疏》）。漳州沿海一带很多人参与其间，如诏安梅岭一带“从倭者且万家，在浙直为倭，还梅岭则民也。”（引光绪《漳州府志》卷四九《纪遗》）。剿倭指挥官俞大猷在《呈福建军门胡公揭》中说：“此村（梅岭）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馀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来。”（见《正气堂集》卷二）。漳州大高桥村约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复至柘林（在浙江），今春满载仍回漳州矣。”（引王文录《策枢》）。以上指漳州沿海一带到浙江“做客”的情况，后来倭寇转到福建，福建沿海一带参与其间的人更多。嘉靖四十一年（1552年）“倭贼、土寇，北自福宁（闽东）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萧条，尽为贼窟，附近居民反为贼间，始虽畏威而胁从，终则贪利而导引，弥漫盘居。”（引戚少保《继光》文集，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其时倭来极多亦不过千人，其馀尽系漳泉之人。”（引叶向高《苍霞室续集》，见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明朝大闹海寇，其实是海禁与反海禁的具体表现。嘉靖御史屠仲律在奏疏中说：“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分之）一，流人十（分之）二，宁、绍人十（分之）五，漳、泉、福人十（分之）九，虽概称倭夷，其实自编户之齐民也。”（引《屠侍御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二）。

那时日本割据势力很盛，号令不统一，由于对中国朝贡利益很大，而次数有限制，引起争贡。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日本二使争贡事件。《明史》卷八一《食货志》记载：“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

撤销市舶司停止朝贡贸易更加导致走私贸易盛行。明廷连年下了

几道禁令：“嘉靖三年规定，对“私代番夷收买禁物”或“揽造违式海缸私鬻番夷者”处重刑。嘉靖四年又规定，凡双桅海船一律扣留，以通番论罪，遣戍边卫（充军）。嘉靖八年更规定，“居称番货，以为窝主”，“所有航海大船一律报官折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嘉靖十二年再规定，“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居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引《嘉靖实录》）。

三令五申，严办外贸参与者，一年比一年严厉，以后甚至对其邻居也要连坐办罪，这说明走私贸易虽严禁而不止。以后发展到中国海商与日本海商互相勾结，窃据海岛为基地，分掠内地，倭患日烈，最严重的是浙江、福建两省。

嘉靖年间在我国东南沿海从事武装走私贸易的还有葡萄牙人，许多漳州人参与走私活动。《明史·朱纨传》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久，奸民阑出，勾倭及佛郎机（葡萄牙）诸国人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据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势家护持之。”《明史》记载，在双屿参与葡人贸易活动的有倭（日本）人，我国则有許多漳泉一带的人，李光头便是漳州人。巡抚朱纨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准备进攻双屿，派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分驻漳、泉、福宁，防止葡人逃窜福建，然后派都司卢镗从海门进击，摧毁双屿贸易基地。朱纨在《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奏疏中说：官军在双屿捕获六、七十人，其中漳州人、南京人各一，宁波人三；另有两个漳州人，一个被斩首，一个溺死，其余逃散。

双屿贸易基地被摧毁后，葡萄牙人便在漳州人李光头等引导下转移到漳州沿海。据《东西洋考》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之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以后，葡人转移到诏安走马溪继续贸易，被官军击败。《明史·朱纨传》将这两件事联写在一起：“至（嘉靖）二十六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葡萄牙）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又犯诏安，官军追击于走马溪，生擒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余遁去，纨用便宜斩之”。

走马溪在铜山岛（今东山县），原属漳浦县第五都，嘉靖九年从漳浦